



托马斯·海贝勒 中国研究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Thomas Heberer
in China Studies*



[德] 托马斯·海贝勒 著

郁建兴 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托马斯·海贝勒

中国研究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Thomas Heberer
in China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研究文选 / (德) 托马斯·海贝勒著; 郁建兴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308-17073-4

I. ①托… II. ①托… ②郁… III. ①中国—概况—文集 IV. ①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4451 号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研究文选

(德) 托马斯·海贝勒 著
郁建兴 等译

责任编辑	余健波
责任校对	牟杨茜 於国娟 杨利军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彩 插	4
印 张	28.25
字 数	436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073-4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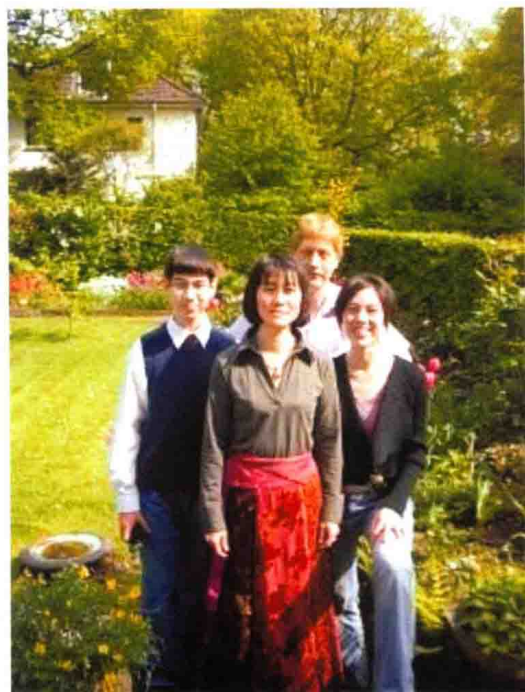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近影



海贝勒与王静结婚（1979年8月）



海贝勒与妻子、儿女
合影（2003年）



海贝勒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1981年）



海贝勒与王静在兰州调研（1981年）



海贝勒调研小商品市场（1986年）



海贝勒在河北总十庄镇调研（1993年）



海贝勒重返凉山州美姑县（2000年）



海贝勒在凉山州布拖县调研（2001年）



海贝勒捐赠小学（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2003年）



海贝勒教授部分中文研究论著



海贝勒与中国学者在一起（2011年。右起为俞可平、赵宝煦、海贝勒、何增科）



海贝勒夫妇近影（2015年）



海贝勒在家中接受郁建兴访谈（2014年）

代序:发现真实中国与研究的兴起

——托马斯·海贝勒访谈录

郁建兴*

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中文名亦称“王海”),1947年生
于联邦德国黑森(Hessen)州的工业城市奥芬巴赫(Offenbach),当代德国
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曾长期担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
究所所长、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
与制度变迁以及环境治理、环境政策等。他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
迁和不同角色(如企业家、农民、地方官员)的研究已经超过40年,已经
出版、编辑50多部中、德、英文著作和10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许多
SSCI期刊及高引用率论文。他的著作和论文被出版、翻译为11国语言
(英、中、日、韩、越、蒙、俄、法、西、德、葡)。他还担任“The China Quar-
terly”、“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Chinese Gov-
ernance”和“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等10余种著名国际期刊
编委。曾任德中友好协会主席(1984—1990),并组织了许多中德社会文
化交流活动以增加中德互信。2013—2015年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现任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资深
教授。

一、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郁建兴:亲爱的托马斯,我刚刚校对完您的著述目录,其中绝大部分

*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在海贝勒教授任教浙江大学期间,以及于2014年7—8月、2016年12月—2107年1月担任杜伊斯堡大学访问教授期间,多次访谈海贝勒教授。本访谈录基于上述访谈和多封电子邮件写成。博士生谈婕、周皓昕对本访谈录也有贡献。

都是关于中国的研究。从学科背景看,从社会人类学到政治学;从空间上看,从四川凉山彝族及彝族企业家开始,到东部、中部、西部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企业家,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从时间上看,从1977年博士论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特别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方法为主题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研究领域,至今已达四十年,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我首先想知道您的中国研究历程。

托马斯:我与中国结缘于1969年。您知道,1968年开始,整个西方世界都发生了学生运动,这个运动风靡世界。当时德国学生反对父母一辈排除其在纳粹时代的历史,同时抗议权威性的制度、僵化的官僚体制和过于保守的德国教育系统。1967年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这仅仅满足了我父亲的愿望,他希望我成为一名公务员。公务员意味着一个体面的铁饭碗。但是,我那时并不对法律、法条注解和制度感兴趣。我更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和人的行为。因此,在1969年,我将我的专业转成社会人类学,并辅修了哲学和政治学。在此期间,我听了不少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演讲,其中包括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3个学期后,为了更独立于父母,我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转学至历史悠久的哥廷根大学。这里的学生运动并不像法兰克福大学那样激烈,但是某些学科中的学生运动以左翼的学生“基本组”的形式组成。我们这些学生在“社会人类学基本组”中对我们学科的历史和理论进行批评性的评价,如指出西方人类学及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背景。我们在寻找适合社会和科学的政治替代品过程中,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著作和它的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我接触到了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作者当时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他属于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移民美国。他在书中尝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观察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可惜的是,他只出版了第一卷。他在这本书中的精彩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中国,包括它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同时,我致力于改变德国资本主义社会。

我在四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共产党的

农民和工人政策为例》。197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和13人应中国邀请访问了北京、大连、鞍山、沈阳、唐山和遵化。我们对所见所闻感到振奋，高度赞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和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那时我们认定毛主席领导下的发展路线对于中国来说是正确的，对日益官僚化的苏联模式是一个真正的替代。我在回到德国后意识到，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必须得在中国多待一段时间。因此，我打算博士毕业后去中国找工作。当初在北京我就听说有一些德国专家在外文局、中央广播事业局外语部，还有的在大学教德语。于是，我就去了位于波恩的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在那里作了咨询。1977年，通过面试及语言考试，我终于获得在北京周报社德语组首先工作两年的机会。1977年7月1日开始，我在那里做了四年多编辑和翻译工作。我记得一位在中国居住和工作30年的商人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他说，来中国3个月后他觉得他理解了中国的一切，3年后他意识到他对中国其实一无所知。30年后，当他回顾过去时，才认识到他只开始了解中国。这本书使我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理解扎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多样政治结构和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非常困难。另外，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迅速变化，要求我反思和检视过去对“文化大革命”、平均主义以及中国的看法。从这开始，我每日阅读中国报纸书籍，跟中国同事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加上我的中国妻子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让我慢慢地深入认识了解中国。

1981年结束北京周报的工作后，我和我妻子进行了第一次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感兴趣的社人类学家，我到达北京后不久就开始查阅相关的中文资料，然而这样的资料非常少。外文局的图书馆里只有少量20世纪50年代关于若干少数民族的简短描述。更糟的是，少数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使得这些少有的文献都成了内部机密，外国人没法看到这些文献。最终，我在外文局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英国记者阿兰·温宁顿(Alan Winnington)的书。他在1958年造访了三处少数民族聚居地，分别是四川凉山彝族、云南景颇族和佤族，这一研究提供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有趣资料，并用英语描述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社会体制及其变化。

我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采访了两位在该学院进修的凉山彝族人,其中一位是西昌消防队的干部,另一位是越西的妇联干部。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的个人情况,讲述了彝族的历史和现状。这使我下定决心,等北京的工作结束后就去凉山开展调研。随后,我通过在北京的单位向国家民族委员会递交了相应的申请。国家民委、四川省政府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最终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和妻子于1981年8月抵达成都,然后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西昌市。去凉山前几个月内我熟悉了已有的关于彝族的文献,对彝族历史、发展、风土人情有了大概的认识。我们在几周内采访了西昌周边昭觉、美姑、越西、喜德的地方干部、农民、彝族文化和社会专家、家支头人和集传统治疗师、神父和萨满等身份于一身的“毕摩”。调查的主题是以凉山彝族少数民族地区为例的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自治政策。陪同我们的包括一名彝族翻译谢友仁老师和一名任职于自治州政府的汉族司机王金龙。谢老师对彝族和彝族文化非常了解,生活经验使他能够避开一些当地禁忌,其中包括我后来对毕摩的访谈。毕摩在彝族社会中有着超然的地位,其重要性一再被彝族地方干部提及。毕摩的特殊意义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治疗师、死者灵魂的指引者、精神守卫),更体现在社会和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领域(作为医生、地质学家、气象学家、熟知彝族文字的专家)。每个彝族人都熟知他们,这些人有着很高的社会声誉。在“文革”期间,他们曾因被视为“骗子”和“传播迷信的人”而被逮捕,并被安置于劳改所,通过体力劳动接受改造。他们的行动表面上被禁止了,然而实际活动转入了地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农村实际上没有医生。因此,在山中零散生活着的人们,迫切需要传统的治疗师。不仅如此,这些人同时还能够理解古老的彝族文字,能够预报天气,还能够举行重要仪式(结婚、葬礼、建房、旅游等等)。此外,彝族人坚信“万物有灵”,也就是说,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有着精神和意识。世界充满鬼神。为了整治这一充满神灵的世界,平衡人和自然的关系,按一定礼仪将逝者送去另一个世界,人们需要毕摩。

我咨询翻译是否可以采访几位毕摩,他断然拒绝了:“如果你是中国的朋友,你就会放弃这样的请求。”但是,无数名彝族地方官员坚称毕摩

是彝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想要理解彝族，必须找毕摩谈一谈。陪同的人最终同意带我去见毕摩，但他让我带两瓶烧酒去，这会让毕摩高兴，从而让他们愿意与我谈话。随后，我们对两位毕摩进行了半官方的访谈。他们身形高大、强壮，很自信。数代以来，他们的家庭一直将毕摩的职责传给家族中的长子。他们认为，在他们身上具有凉山彝族的才智。他们掌握着传统彝族文字，能够识别最重要的古老字迹，能够预报天气，会将逝者送去另一个世界，并且能够制服鬼魂。相比于受西方医疗培训的正规医院，毕摩如何评价他们在医疗上的作用呢？对于我的询问，其中一位毕摩说：“是的，正规医院的医生也许能够控制住传染病这类疾病，但是90%受神灵侵袭的疾病，他们可能就无力治愈了，这只有我们毕摩能够救治。”他们的学识代代相传，已经延续了百年。他们不愿意透露这些知识，尤其不愿告诉那些总是想采访他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学家们。这些知识曾经是，也一直将成为他们的秘密。现今，在凉山，又可以见到很多毕摩，大多数都是“小毕摩”，主要负责治病和预告天气情况，只有少数是“大毕摩”，他们能够主持通达神灵、降妖除魔的大型仪式。

许多被访者，无论是干部、学者还是农民的坦诚程度都令当时的我吃惊，我很容易获得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数据。人们坦率地讨论过去和当时的发展问题。然而，调查的一个巨大障碍来自于传统习惯：村民必须好好接待远道而来的“重要客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杀猪宰羊来欢迎我。鉴于村内的民众极度贫困，我的来访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因此，我逐渐放弃了去彝族人家中进行访谈的做法。

村里的屋舍都是没有窗户的泥土房子，只有房顶有开口可以透光进来。大部分房子不通水电。家畜同样被安置在房子里。进入房子前我们首先需要递上一瓶小米或玉米酿造的高度烧酒，因为他们认为烧酒可以去驱赶访客有时会带入的邪恶鬼魂。然后，访客将烧酒沿着炉灶周围倾倒于泥地上。此时主人屠宰最大的家畜，把内脏扔掉后将肉切成大块扔到水里煮。他们还会端上带皮的土豆和很浓的大蒜汤。彝族人吃不吃蔬菜，因为他们觉得喂养家畜的营养已经在家畜的肉里了。这意味着，彝族人有着饲养家畜的传统，而且他们很少种植蔬菜。客人吃饱了

以后主人才会从旁边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们吃剩下的菜。采访和吃饭大约会持续两个小时。如果我们每天都要做四个这样的访问,意味着每天都要吃四顿一样的饭,很快我的胃就无法承受了。

我是当地几十年以来第一个外国来访者。我们所到之处都引起了大堆人群的围观。大部分当地人不会讲汉语,因此我们经常只能和年轻人交流。他们觉得我的大鼻子特别有趣。“如果我们还能买卖奴隶(彝族曾经有奴隶市场,其中大部分奴隶都是被打劫和绑架的汉族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我能卖多少钱?”我曾经用汉语这样问一些中年男人。“二十两银子”,其中一个人这样回答。“这么贵?”我很惊讶,“我并不是一个很强壮的劳动力。”“不是因为这个,”他说,“因为你的大鼻子。一个有这样鼻子的奴隶(对我来说这鼻子一点都不大。——托马斯注)非常特别,所有人都会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奴隶。”

我的第二项重要研究开始于1986年和1987年,作为我的教授资格论文。我在不莱梅大学获得了一个由大众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个体经济对劳动市场和城市经济的作用”。八个月内我造访了杭州、昆明、成都、兰州还有衢州、山丹、绵阳、江油和西昌,在这些区域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研。我总共采访了超过1500户市场和老城区的个体户。这使我充分了解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面临的问题。无业人员、残疾人、国企和集体企业中的刑满释放人员、当时“阶级敌人”和“反动分子”(包括大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官员)的后代或仅仅是收入很少的穷人,占到了被访者的大多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帮助组织了这一次研究,因为我那时是德中友好协会联邦理事会主席。虽然烈日炎炎,我还是早起晚归在街边集市挨家挨户进行采访。陪同人员一般来说都是当地对外友好协会的年轻人。在成都,这名同事累得筋疲力尽,以至于他不得不经常休息,拖慢了我的进度。

按照规定,我的研究还需要有一名当地市场部门的人员正式陪同。然而,他们的任务看起来非常吃力,往往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就跑回他们的办公室了。与此相反,我和协会陪同的关系比较好。协会的陪同会把我介绍给被访者。我们在小摊、工坊、店铺或者是与他们的工坊和店铺连在一起的宿舍里对他们进行提问。我默记了我的题目,这样我只用记